

中亚研究资料·增刊

# 中亚民族历史译丛

(第一辑)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

## 目 录

- 1 前 言 郭平梁
- 历史研究 ·
- 4 塔吉克史纲 [苏] B·B·巴尔托里德  
18 “八里”与“斡耳朵”考 艾默尔·艾辛  
38 迦毕试国编年史稿(上) [日] 桑山正进  
60 葛逻禄在乌兹别克族源中的作用 [苏] K·III·沙尼亚佐夫  
68 察合台兀鲁思东部统治者年表 [苏] O·Φ·阿基穆什金  
79 哈萨克大帐部族集团 [日] 佐口透  
99 关于穴黄原产地色楞格说 [日] 羽田明  
105 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性 [苏] B·C·库兹涅佐夫
- 民族研究 ·
- 115 民族关系辩证法的某些问题 [苏] T·吐列诺夫  
121 列宁的无神论遗著和现代宗教问题 [苏] И·礼巴洛夫  
127 十月革命前乌兹别克民族中的基普恰克人 [苏] K·III·沙尼亚佐夫  
139 哈萨克妇女生活 [德] 冯加·班  
146 伊塞克库尔的卡尔梅克人 [苏] H·П·茹可夫卡娅
- 史料与史科学 ·
- 151 阿拉伯文献中有关中亚史料的几点考证 [法] M·格里尼斯奇  
163 作为研究中亚史料的阿拉伯地理文献 [德] M·马洛特  
168 马卫集论中国  
179 白菜脱胥乃德有关蒙兀儿斯坦史的两条注释  
187 努斯拉特纳麦 (تواریخ کزیدهٔ نحرث نامه 胜利之书)

## 前 言

我们中国人研究中亚的历史与民族，有自己的便利条件，这就是我们拥有大量的汉文资料，可以直接利用。自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后，历代史书都有关于中亚地区的记载。正史以外的私人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到中亚历史与民族的，特别是那些到过中亚的旅行家的旅行记，更是中亚历史民族资料中的珍奇。汉文资料有许多可以与其他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互相取长补短；也有不少是独一无二的缺门货，离开了它，有些事人们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与其他文种资料比较，汉文资料的突出特点是时间概念、地域概念比较清楚，这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中亚考古有的也要依靠汉文资料来断代、定名。

但是，只靠汉文资料，是不能对中亚历史和民族进行研究的，至少是不能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古希腊文的史籍，没有古波斯文的铭刻等史籍，汉以前的中亚，汉及汉以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匈奴西迁、阿瓦尔人西迁、西突厥与波斯、东罗马的关系等等，人们不是全然不知道，就会知之甚少。从唐朝后期开始，中亚伊斯兰文化盛行，波斯文、阿拉伯文的著作丰富多采，其中有不少留传到了现在，是研究这一时期中亚历史和民族不可或缺的资料。明清时期的中亚，人们除继续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写作而外，又新创了一种名叫察合台文的文字，察合台文文献亦很丰富。研究历史与民族，必须充分利用考古资料与实地考察报告；中亚考古成绩卓著，举世瞩目，用俄文等文字撰写的考古报告及其他形式的成果洋洋大观；到中亚旅行的除中国人而外，亦有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中亚进行探险、考察的人简直是川流不息，他们的著作，多是他们耳闻目睹的记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沙俄及苏联、日本、匈牙利等许多国家都有不少研究中亚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著作，我们应当参考，吸收其科学的、有益的部分。

利用外文资料有两种方法，一是看原著，一是看译本。能看原著，当然最好，但就我们目前的条件而言，恐怕并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能做到这一点。通俄语的，不一定兼通英语；通德语的，不一定兼通日语；兼通英、俄、德、法、日等主要外语的中国人就更少了。至于波斯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学者懂得，但绝大多数汉族学者则是门外汉。正如季羨林先生说的：“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学习语言的才能，决不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就有必要去看别人的翻译。”通过翻译以取得外文研究资料和吸收外国的研究成果，这是普遍的需要，非独中亚历史

与民族学科为然。没有翻译，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没有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举个例子，十月革命前就蜚声于学术界的苏联著名的中亚史权威B. B. 巴尔托里德不懂汉文，他所使用的汉文资料都是通过译文才取得的。一本好的译作，不仅对不懂那门外文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于懂得那门外文但尚不精通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粗粗浏览，知其大意是一回事，字斟句酌，完全弄懂又是一回事。我常常听到一些懂外文的、甚至懂多种外文的同志谈译文的重要性，他们还说，看译文比看原文效率要高得多。我想，翻译外文著作和利用翻译作品进行研究，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如果可以这么看的话，那么，实践证明，这种分工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就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了，因为它大大地提高了效率。

我国学术界老前辈有很多人非常重视介绍与翻译外文著作，可以说是成果累累。关于这方面情况，季先生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中作了很好的概括，这里就不重复了。要指出的是，季先生所提到的那些在翻译上做出贡献的学者中，有不少人的译作是有关中亚历史与中亚民族的，尤其是冯承钧先生的译作。解放以后有关中亚历史与中亚民族的翻译成果，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得的。比较重要的有：（伊朗）志费尼《世界侵略者史》，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英国）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其中包括（意大利）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鲁不鲁乞东游记》等，吕浦译，周良霄注；（波斯）拉施德《史集》，余大钧译，已出第一卷；（亚美尼亚）乞刺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纪》；（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苏联）维·维·巴尔托里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前人《蒙古侵略时期土尔克斯坦》，张锡彤译，不久即出；前人《中亚简史》，耿世民译；（日本）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穆哈买德·米尔咱·海达尔《拉施德史》，原新疆民族研究所译，不久可出；（法国）L.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升译；（苏联）勃·德·格列科夫《金帐汗国兴亡史》，余大钧译；（苏联）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马曼丽译；（英国）约·弗·巴特利《俄国·蒙古·中国》，吴持哲、吴有刚译，胡仲达校；（俄国）伊·费·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王之相译，陈汉章校；（俄国）A. H.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利亚》，凌颂纯、王嘉琳译，又有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本；（英国）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武汉大学外文系译；（日本）佐口透《新疆社会史研究》，凌颂纯译；等等。古典著作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已经译成了现代维吾尔文，汉文译本已出了耿世民、魏萃一的节译本，还将出全译本；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已经开始出现代维吾尔文译本，接着还要出汉文译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耿世民译。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民族译丛》，中外关系史学会编的《中外关系史译丛》，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的《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亦经常刊载有关中亚历史与民族的译文。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加强了。

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对国外有关中亚历史与民族的著作的翻译介绍工作已经做

得很好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还要大大地加强。许多有关的古典名著，大量有关的考古资料，一部部有关的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专著，至今均还没有中国的译本；在我们的研究工作者的书架上，自然也就缺少这方面书籍。“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许多在国际上早就是常识性的知识，到我们这里来却还是新闻。许多在国际上早就有了定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是苦思冥想，争论不休。许多问题在国际上经过争论，陈旧的观点不断被推翻，新的见解不断涌现，而我们则往往是固守在几十年前的老阵地上。当然，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不能单靠翻译介绍有关的外文书刊，但是，大力加强对有关外文书刊的翻译与介绍工作，在推动这方面科研事业前进上，必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有关中亚历史与民族的外文书刊，浩如烟海，翻译介绍从何着手呢？我想，一是要选择，即着眼于那些最重要的、我们最急需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不能一见有关的东西就译，那样就会花的力气很多，收效则不一定很大。二是要有计划，可不可以设想编译一套中亚历史与民族研究基本丛书，分期出版；另外出一本中亚历史与民族译丛，选译当前有关的重要论文，定期出版。三是加强学术情报工作，将国外的有关学术动态，及时地收集编纂起来，提供给有关的研究工作者。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还没有条件按照预想的目标去做。不过，这件事情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感受到的。这里编印的《中亚历史民族译丛》（第一辑），就是我们大家实践自己的想法的初步尝试。译文多数出于我所同志之手，只有少数是其他单位同志的稿件。《译丛》内容涉及的面很广，没有什么中心，也很难说每一篇都很重要，都很有用；译文也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这就需要同行们阅后多加指教。《译丛》是作为《中亚研究资料》的增刊而问世的，内部发行，所以如须引用，请查对原文，出处注原文。

郭平梁

一九八五年八月



## 塔吉克史纲<sup>①</sup>

(苏)B.B.巴尔托里德著

王嘉琳译

陈继周校

现代突厥斯坦的土著居民是属于伊朗族系的。本文不涉及有关伊朗部族的祖国、他们古代扩张的以及中世纪时又经常缩小的地理疆域等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仅限于搞清楚如下问题，即在从公元前六世纪起的一千五百多年的期间，在现代突厥斯坦地域内的两支伊朗族系的文化民族——粟特人和花拉子模人的史实。在别尔西波黎(Персеполь)遗址附近的大流士(公元前522—486年)的墓里保存下来的纳入这个王的帝国版图内的诸民族的雕像里，就有粟特人和花拉子模人的雕像，我们仅掌握这两支民族濒临消失时期的有关他们语言的或多或少较为翔实的信息。这些消息记录在公元1000年花拉子模人比鲁尼用阿拉伯语编撰的诸民族纪年的文集里<sup>②</sup>。比鲁尼在说到粟特人和花拉子模人的历书时，援引了月、日、宗教节日的地方名称。根据这些名称，可以得到有关这两种语言和波斯语作比较的方言特点的一些概念。

在中亚的这两支农业文化的伊朗民族中，花拉子模人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过着独立的政治生活。花拉子模人在波斯阿凯米尼德王朝建立之前称雄中亚，曾一度屈从于波斯人，后来摆脱了这种附属地位。在亚历山大·马其顿征服中亚时期(公元前330—327年)，花拉子模有自己的王，而以泽拉夫善流域为中心的粟特人的地区却是波斯的一个行省。大家知道，无论亚历山大，还是希腊一大夏的诸王以及前穆斯林时期中亚的游牧民族的征战活动都未波及花拉子模。穆斯林的征服终止了花拉子模政治的，后来竟至民族的与世隔绝的局面。但是，穆斯林统治者直到希瓦的最后的乌兹别克诸汗都一律采用前穆斯林时期花拉子模统治者的称号——花拉子模沙。在突厥斯坦一些地区的所有的~~前穆斯林时期统治者的~~称号中，只有这个称号流传至今。粟特人的地区先纳入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后归入希腊一大夏帝国的版图。这个地区至少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也许，还要更早一些，多次遭受游牧民族的侵袭。因此，这里不曾有过建立花拉子模那样的政治独立传统的良好土壤。只是在穆斯林征服前不久，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才在某种程度上当了整个粟特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号称“粟特伊赫什德”(Ихшад，费尔干纳的统治者的称号)。但是，诸伊赫什德的政权很不稳固，在伊斯兰教统治时期迅速瓦解，因而在突厥斯坦后来的生活里，未留下任何痕迹。但是，看得出粟特人对文化历史进程的影响比花拉子模人要大得多，而且他们是

突厥斯坦迤东地区前亚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只是由于中国新疆和中国本部的边境地区的考古发现，粟特人的这一活动历史才被阐明。根据对照比鲁尼的粟特语材料，公认在敦煌<sup>③</sup>中国人建的城墙上的一个塔楼里发现的公元一世纪的契约文书为粟特语。这些文书的字母是属于通过波斯传入中亚的东闪语的，或“亚拉姆语”（Арамейский）的字母。这样的契约文书在罗布泊也有所发现。在更西面的吐鲁番地区曾发现宗教文献，有佛教的，摩尼教<sup>④</sup>的和基督教的，也是用粟特语写的。这些文献通常是七世纪以后的。总的说来，我们在这些文献里看到了那种字母，但书写形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研究粟特语的主要学者，已故的高桥教授（Гольбо）未看出“早期粟特”文书和佛教文献二者之间语言上的差别，尽管二者时间相隔很长。摩尼文献和基督教文献是用相当后期的方言写的，而且摩尼文献和基督教文献所用的方言差别也很大。摩尼教徒和基督教徒除了用粟特民族字母外，也使用这两个宗教的传教士传到中亚的那些字母。

关于阿凯米尼德，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以及希腊一大夏诸王时代伊朗中亚文化对游牧民的影响未见翔实材料。从来自东方的（很可能，也是一支伊朗族），消灭了希腊一大夏王国的吐火罗人或贵霜人在公元前二世纪建立的印度—斯基泰帝国的时间起，就开始出现了粟特人的商业、文化活动的痕迹。就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进入了突厥斯坦，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一种看法认为，在我们所知的几种突厥字母中<sup>⑤</sup>，当推叶尼塞—鄂尔浑字母（在这两条河流曾发现碑铭，其中八世纪鄂尔浑历史碑铭最为重要）为最古老的一种字母。它源出于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世纪字母，更为古老的粟特字母。时间上为第二的突厥字母——回鹘字母是属于统治蒙古近百年（公元744—840年），随后领有哈密、吐鲁番、古城（今奇台县—译注）和其他地方现今所属的那部分中国新疆地区几个世纪之久的民族的。这种字母也源出于粟特字母。虽然采用文字一事，就是在中亚也和各地一样，是和宗教传教活动紧密相连的，但是，粟特民族字母的影响比佛教徒（印度字母），基督教徒（叙利亚字母）和摩尼教徒（亚拉姆字母斜体）带来的那些字母的影响强烈得多。迄今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认为后来构成蒙古文字字母的回鹘字母，不是人们先前所认为的，源出于基督教的叙利亚字母，而是出自主要由佛教徒保存下来的，却也被基督教徒和摩尼教徒在使用自己的宗教字母的同时，也加以使用的粟特字母。据高桥所见，粟特和回鹘字母十分相似，以致于在这两种字母之间划不出界线来。在蒙古发现的附有汉文碑文，记载着回鹘于公元762年信奉摩尼教的九世纪回鹘汗的粟特碑文，就字母的书写形式看，完全和回鹘字母相同，因而闪语字母远传到大洋是要归功于粟特人的。

七世纪是粟特商业繁荣的鼎盛时期，那时期粟特人的祖国时而受辖于突厥诸汗的（突厥人在现代突厥斯坦的统治地位是六世纪确立的），时而依附于中国皇帝的最高统治。无论那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强大都促进商队贸易的繁荣。粟特人利用这些机会，不仅进行商业目的旅行，而且还在遥远的地方建立商业殖民地。关于这一情况，除了考古发现以外，保留下来的不论是中国同时代人的，还是后一时期穆斯林作者的文字记载都有所证实。中国的史料提到七世纪罗布泊建立的，过了一百年后还享有一些自治权的粟特殖民地。公元630年路经突厥斯坦的中国旅行家玄奘把从楚河谷地到碣石（Шахрисябз）在内的整个地区通称为率利（Суль，一些人认为，Сулик是粟

特—Согд—一词的佛教的和摩尼教的书写形式，是方言语音л转换为л所致)。各地通行一种书面语言，一种文字，从上往下写(后来，畏吾儿人用此写法)。从玄奘的记述里也可以看到，当时佛教未传入粟特人的国家。因此，在伊斯兰教时期，在粟特人中间，除了伊朗民族的拜火教的信徒外，还有摩尼教徒和基督教徒，但没有佛教徒。由此看来，用粟特语写的佛教文献，如果确实是写于七世纪的话，那就不是在粟特人的祖国写的，而是在比较远的粟特殖民地写的。除了玄奘的记述外，再没有直到楚河河岸的大片粟特领土的其他消息，但是，十一世纪的穆斯林作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却说到粟特人的殖民活动远达楚河谷地。他记述了Суглак民族，说“是移居到八拉沙衮的人①。他们出自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那个粟特，只有他们着突厥服”。在那一部著作的另一处说，“八拉沙衮的居民操粟特语和突厥语。塔拉斯②和白城③(Белый город)的居民亦如此”。看来，八拉沙衮和其他地方的居民在十一世纪经历了突厥化影响之下的自己所操语言消失的最后阶段。那时还有操粟特语的人，但已经没有只说粟特语的人了。马合木德·喀什噶里没有提到粟特殖民地进一步向东发展的问题，但是，十世纪波斯佚名地理学家却说到在托古兹古兹(Тугузгузы)，或回鹘的国家，即发现了粟特宗教书籍的中国新疆的那部分地区，有五个粟特人的村庄。那位佚名地理学家补充说，在这些粟特人中，有基督教徒，格布里(Гебри，拜火教徒)和“萨比伊”(Сабии)。后一称谓当时泛指多神教徒，其中包括佛教徒在内。在撒马尔罕也这样称呼摩尼教徒。由此可以看出，粟特殖民地还在前穆斯林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④。甚至十三世纪初的作者法赫尔·哀丁·穆巴列克沙赫(Факр ад-Дин Мубарекшах)仍保留着突厥字母源出粟特字母的记忆。

穆斯林文献说粟特和前穆斯林时期撒马尔罕的王公领地的南部边界是在玄奘所到之地，即“铁门”附近，或布兹噶勒山口(Бузгал)。这个山口的后面，即是吐火罗人的国家——吐火罗(Тохристан)的起始。阿姆河上游迤北和迤南地区都纳入了它的版图。玄奘在世时，被从粟特国家排挤出来的佛教在吐火罗居统治地位。有过一种特别的字母，从左向右写，由此可以看出，是源出印度的一种字母。从玄奘的记述里看不出这种字母和新疆的库车和和田使用的其他印度字母之间有何联系。在穆斯林作者中，只有萨马尼(Сам’ани，十二世纪)一人说到前穆斯林时期吐火罗使用的字母。萨马尼在记述瓦什吉尔德(Вашгирд，现在布哈拉的法札巴德，Файзабад)时，说到“那里，在伊斯兰教初期，在书里写着熟悉的字母”。由此看出，萨马尼说的不是他所发现的新事实，而是他的同时代人都熟知的事实。可是我们只得知这一条消息。萨马尼提到的“书”，大概，已无影无踪了⑤。

## 二

七一八世纪的阿拉伯人的入侵改变了突厥斯坦伊朗居民的民族成分并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在前穆斯林时期的波斯，萨珊王朝统治下(三一七世纪)，塔伊部落(Тай)是地理位置上最靠近波斯的贝都英部落。塔伊部落在幼发拉底河迤西建立了黑拉城(Хира，大家知道，在伊斯兰教统治时期，在黑拉城附近，建立了库法城)。这个城后来是臣属波斯的阿拉伯酋长国的都城。还在公元三世纪时，在以得撒



(Эдесса, 现在土耳其的乌可法——译注)著书的一位叙利亚作者使用了与“萨拉钦”(Саракин)一词等同的“塔伊”一词,泛指所有的贝都英人。由这个部落的名称派生出了中波斯的,或巴列维的(帕提亚王国和萨珊王朝时代的文字语言)和亚美尼亚的Тачик一词,意为“阿拉伯人”。在穆斯林时代,我们看到比较晚期的形式——Тазик和Тазы。从第一个词派生出了突厥词语Теджик<sup>①</sup>。字母з和дж交替,发ж音。确实,我们在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大辞典里看到Тежик的书写形式<sup>②</sup>。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和另一位十一世纪的突厥作者玉素甫·八拉沙衮一样,使用了这个词,其意已经是“波斯人”了,但是先前,突厥人把汉文称之为大食的阿拉伯人叫做塔吉克人。

按照那个时代的概念,信奉伊斯兰教者就成了阿拉伯人。当728年布哈拉的大臣们向阿拉伯的总督阿什拉思(Ашрас)报告穆斯林的传教活动在突厥斯坦的胜利时,他们用了“所有的人都成了阿拉伯人”这样的词语。自然,对突厥人说来,与其说属于阿拉伯民族的人,不如说是来到他们草原的信仰伊斯兰教和体现穆斯林文化的人为塔吉克人。在这些人中,毫无疑问,数量的优势迅速转向西伊朗人,因为移居中亚的阿拉伯人人数并不很多。由是突厥人认为,波斯语就成了塔吉克语。当突厥人征服了穆斯林地区并进一步熟悉了这两个主要的穆斯林民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时候,他们保留了“塔吉克”一词,不过仅指波斯人,开始把“塔吉克人”同阿拉伯人区分开,虽然最初是波斯人和仿照他们的突厥人把阿拉伯人叫作塔吉克人。很可能,粟特人也认为,不仅阿拉伯人,而且波斯—穆斯林人也是塔吉克人。但是,我们不掌握当地伊朗人如此使用“塔吉克”一词的例证。

突厥斯坦文化地区并入哈里发国家版图后,完全改变了当地生活的特点。尽管六一七世纪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成果辉煌,然而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仍停留在亚历山大·马其顿时代的水平上<sup>③</sup>。从亚历山大时代一直到穆斯林征服时代,这中间的一千多年,对突厥斯坦说来,在这方面几乎是毫无痕迹地流逝的。无论公元前四世纪的马其顿人,还是公元七世纪的阿拉伯人来到突厥斯坦,这里都是由住在坚固城堡里的农业地主贵族统治的。城市比较少,规模也不大。而在伊斯兰教统治初期,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优势转向商业阶层。来自波斯的移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新制度的代表者,伊斯兰教在波斯消灭了被宗教神圣化了的支持腐朽阶层制度的萨珊专制王朝,给波斯人民的经济和文化进步开辟了广阔的场地。然而,在这同时波斯人出于爱国主义却支持自己国家的传统,萨珊王朝则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这些传统随同波斯语言一起为中亚的伊朗人所接受。当地的贵族代表起初作为哈里发的总督,后来作为世袭的统治者参加了突厥斯坦穆斯林的政治生活,他们开始以萨珊王朝为自己的祖先。这些王朝中势力最强大的代表,出自布哈拉的,十世纪统治突厥斯坦和呼罗珊(хорасан)的萨曼王朝这样作。十二世纪,骨咄地区(хутталъ),现代的库里雅布地区的统治者也这样作。甚至布哈拉的居民十世纪时仍操突厥语,但是萨曼王朝国家的官方公文用语,与阿拉伯语平起平坐者,则只有被称之为“宫廷”语言的波斯语。撒马尔罕出生的一位诗人鲁达基就属于穆斯林—波斯文学古典诗人之列。粟特语逐渐地从人民大众的语言里被排挤出去了。凡河(Фан-Дарья)河源之一的雅格诺卜河(Ягноб)河谷的两支方言,现在被认为是粟特语的唯一遗物。雅格诺

卜方言不是我们熟谙的粟特文学语言的直系语支，但是它们最接近基督教文献的语言⑭。

很可能，还在前穆斯林时期，平原上的居民和山地居民之间就形成了差别。根据语言的构成来看，我们在穆斯林时代看到一些古老的术语：Гар即Гора，Гарча，或现在读音为Гальча，意山地居民，山地人。Гарч或Гарчистан，意山区。专门称构成十一世纪初的一个特别王国的穆尔加布河上游地区为噶勒奇斯坦（Гарчистан）。另外，十二世纪的萨马尼说到“撒马尔罕的噶勒奇斯坦”，很清楚，指的是泽拉夫善河上游的山区。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著述里，没有用这个术语指称阿姆河上游山区居民的例证的。看来，在穆斯林作者的著述里，关于特别的其他人不懂的语言概念同Гарча或Гальча（噶勒察）的概念没有联系。关于穆尔加布噶勒奇斯坦的方言只说到，正如根据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可以料到的，它是介于也里（Герат）和谋夫（Мерв）方言之间的中间语言。近代，Гальча一词在中亚用作“山地人”，而不指称特殊的语言集团。俄国使臣梅茵多尔夫（Мейендорф）1820年在布哈拉听到，人们把住在布哈拉迤东的和希撒尔（Гиссар）迤北的，即泽拉夫善上游地区的，操波斯语，不谙其他语言的，但外表与塔吉克⑮迥然不同的贫穷的独立的人叫作Гальча。我们在英国研究人员沙敖（Шоу）的书里看到广泛使用Гальча这一术语。据他的记述，这一称谓在“自己的突厥邻居”那里，理解为库里雅布、马特恰（Матча）、喀拉提锦（Каратегин）、达尔瓦斯、罗善、什格南、瓦罕、巴达克山、泽巴克（Зебак）或桑格里奇（Саглич）、明德札（Минджан）等地的居民。在关于伊朗语文材料的德文汇辑里，在根格尔⑯（Гейгер）的文里，Гальча一词被认为是帕米尔河谷的操特殊方言的伊朗居民的通称。和平原地区操同一塔吉克语言的达尔瓦斯、库里雅布、喀拉提锦和巴达克山不算在这个地区内。无论如何，就这个词的词源学来看，Гальча一词丝毫不含有侮辱的贬意，但是由于山地人文化水平低，平原上的居民略带些看不起的贬意使用这个词。在波斯语辞典里，Гарчеги一词（由Гарча派生的名词），含有“粗鲁，无知”的意思。Гальча一词意“流浪人”，自然泽拉夫善上游地区的山地人（大概，在其他地方，山地人自己都不知道Гальча这个词）不愿意被人称为Гальча。在泽拉夫善，潘治肯特（Пенджикент）的后面，大概是法里噶尔（Фальгар），俄国的一个研究者С·Д·马斯洛夫斯基听到人们说，“我们不是Гальча；Гальча是住在雅格诺卜和马特恰地方的愚昧的塔吉克人，而我们不是Гакьча”⑰。可能，在一些山地人那里，接受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文化的概念和塔吉克一词有关。那位С·Д·马斯洛夫斯基“在达尔瓦斯东部、什格南、罗善”地方听到说，“我们不久前才成了塔吉克人”的这番话⑱（可惜，这位研究人员没有询问自己的交谈者，他们先前是何民族）。

十世纪末，突厥人重又彻底地掌握了突厥斯坦的统治大权。除了塔吉克一词外，还使用出处不完全清楚的塔提（Тат）一词来指称被征服的伊朗民族。在这种场合下，与其说指的是非突厥族源的人，不如说指的是定居文化的人。伊朗人，回鹘也都是塔提。土库曼人就是现在仍沿用其旧意，使用这个词。在土库曼人看来，乌兹别克—希瓦人也是塔提。“塔提”一词在外高加索有民族的意思。在突厥斯坦，当地的伊朗人从不自称为塔提，但是在自己突厥主人的影响下，开始自称为塔吉克人。如此使

用塔吉克一词的实例，我们在萨曼王朝还不曾看到过，但是十一世纪伊朗人同突厥统治者交谈时，使用“我们，塔吉克人”<sup>①⑥</sup>这样的词语。历史学家贝哈基(Бейхаки)把这番话归之于1039年和哥疾宁苏丹马斯乌德谈话的一个有名的伊朗人(大家知道，出自萨曼王朝突厥近卫军的哥疾宁王朝继承了萨曼王朝在阿姆河迤南的地区)。

从十一世纪起，伊朗地区越来越多地归附突厥政权，当然，山区或被群山护卫的地区却较长久地保住了自己的独立性。在伊朗民族建立的王朝中，只有一个王朝——古耳王朝(七—八世纪)对这个大国怀有僭望之欲。古耳王朝(Гуриды)出自阿富汗西部的古耳山区，占领着包括阿姆河迤北的一些地区，例如，苏尔罕河谷在内的广大地区。

在争夺穆斯林世界东部地区统治权的斗争中，古耳苏丹们十三世纪初被花拉子模的突厥统治者——花拉子模沙们所击败。这时期的花拉子模，不仅就突厥的政治统治而言，而且就大多数居民的语言说来，已经是地道的突厥国家了，虽然十一世纪初，那里的人们说和写都还是花拉子模语。遗憾的是，不论是花拉子模语的典籍，还是花拉子模语的文书，我们都一无所获<sup>②①</sup>。

除了王朝之间的斗争外，民族之间也出现纷争。在记述花拉子模哲兰丁(Джелаль-ад-Дин)和蒙古人斗争的史实时，说到这位花拉子模沙手下的突厥和古耳的军官们的冲突。突厥军官建议和解，却被古耳人回敬的“我们是古耳人，而你们是突厥人，我们不能一起生活”<sup>②②</sup>的这番话驳回。当一位花拉子模沙同马赞德兰(Мазандеран)的统治者缔结盟约时，同时代的人不相信这一友谊能够保持长久，他们说，“突厥和塔吉克人之间的路是漆黑的，难以避免毁灭，友谊和亲姻总是以反目而告终的”(马赞德兰后来实际上被花拉子模人占领了)。当花拉子模的一位宗王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失败并被迫离开花拉子模时，人们告诫他不得前往马赞德兰，因为“塔吉克人从不信任突厥人”<sup>②③</sup>。然而，突厥人没有塔吉克人是不行的。马合木德·喀什噶里援引了一条俗语说“没有不用塔提的突厥人，没有不戴在头上的帽子”。塔吉克人在游牧人的政权统治下，不用说，其处境有时是很沉重的。据史家拉施特的记述，因公正而享有声望的波斯的蒙古统治者合赞汗(1259—1304年)对属下的蒙古人说，掠夺塔吉克人容易，但是到后来，他们就难以得到食物了。蒙古人毒打塔吉克人的妻、儿，忘记他们的妻和儿对他们自己是何等的可贵，而塔吉克人“也是人”。

突厥人需要代表伊朗工业、商业和一般文化的塔吉克人。波斯语在突厥统治者执掌政权时期，是国家公文和文学用语。伊朗商人更加扩大了自己的商业和殖民活动的地区。十一世纪的突厥作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和玉素甫·八拉沙衮用萨尔特(Сарт)一词表示商人。正如现在所证实的，这个词源出印度语。很可能，突厥人与之打交道的最初的商人是印度人，而且佛教传教的成就是与印度的商业成就相联系的。可能，佛教的消失是和商人的作用由印度人转向伊朗人相联系着的。塔吉克人在这方面十分成功地继续了自己先辈粟特人的活动，以致蒙古人可能先于东突厥人，把萨尔特这一术语带到产生商人的中亚伊朗人的整个民族里，带到他们的国家和文化里。Сартаул和Сартактай是萨尔特一词的蒙古语形式。蒙古史诗创造了Сартактай一神奇的河坝建造者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伊朗人在草原上不仅是商人，而且

还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者，特别是灌溉技术。另一方面，塔吉克—穆斯林不是传播自己宗教的传教人，如早先的粟特人。在蒙古部落中间，有基督教徒，但没有穆斯林，尽管穆斯林是商业的主要代表。在游牧人的眼里，属于某种文化类型的标记比民族和语言的标记更为重要一些。成吉思汗把第一个归顺他的穆斯林统治者—葛罗禄阿尔斯兰汗（Арслан-хан Карлукский，在七河北部）叫作Сартактай（萨尔特克兰伊），据史家拉施特的记述，意即塔吉克，尽管葛罗禄是突厥民族，不用说，操突厥语。在成吉思汗时代的碑文里说到他出征返回萨尔特乌尔人（Сартаул）的国家，即花拉子模沙摩河未和他的儿子哲兰丁的国家。1246年到蒙古的圣芳济派修士普兰·卡尔宾（Плано Карпин）说到蒙古人征服了“萨尔特”，指的就是那次出征。在十四世纪佚名阿拉伯语文学家关于蒙古语言的文集里<sup>②</sup>，Сартаул一词被翻译成“穆斯林”一词，但是在蒙古人在中亚和波斯建立的以及十四世纪末统一到帖木尔政权下的国家里，经常使用萨尔特和萨尔特乌尔这两个词，作为塔吉克一词的同义词。在帖木儿儿子嗣执政时期，说到萨尔特的语言和文学不同于突厥人的语言和文学，即萨尔特泛指波斯人。不久前，А·Н·萨莫伊洛维奇指出巴布尔（Бабур，十六世纪初）说萨尔特不同于塔吉克人的记述，完全是一家之言。巴布尔在记述喀布尔地区时说，那里的“草场和盐沼地上住着突厥人，爱马克人（Аймак，混血的游牧人）和阿拉伯人，在城镇和一些乡村住着萨尔特人，在其他一些乡村则住着塔吉克人，阿富汗人”，还有另外三个部族的人<sup>③</sup>。不清楚巴布尔在那些方面发现了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之间的差别，未必指的是语言的差别，因为在——列述喀布尔地区通行的语言时，萨尔特语和塔吉克语都未提到，只提到波斯语（法尔西语），或许，波斯语是萨尔特人和塔吉克人的共同语言。在巴布尔文集的其他地方，未提到塔吉克人。例如，在记述费尔干纳时，只说到萨尔特人和他们的语言不同于突厥人及其语言。

乌兹别克人征服突厥斯坦以后（十六世纪），萨尔特这个称谓就被授给了不论是保留着波斯语的，还是操突厥语的被征服的定居居民。无论十七世纪的作者阿布哈齐（Абулгази）的著作内，还是近代的书里，都特别清楚并一致地说花拉子模的“萨尔特人”不同于乌兹别克人。值得注意的是，阿布哈齐在说到花拉子模的三处，用了萨尔特一词。凡说到伊朗人和他们语言的地方，用了塔吉克一词。阿布哈齐称与他同时代的布哈拉的居民为“塔吉克人”。十九世纪，浩罕的史家经常使用萨尔特一词，而且不止一次地同时提到“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因此说，萨尔特人不同于塔吉克人，但是，从史家的记述里，看不出萨尔特这个词是否专指当地突厥化了的那部分定居居民（欧洲和俄国的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尽力把这一层意思赋加在萨尔特一词上）。在费尔干纳，凡表示“全体居民”的意思时，经常使用“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这就是说萨尔特人较之于塔吉克人更加清楚地有别于乌兹别克人。著名的费尔干纳生活问题的专家，已故的B·B·纳里夫金说，费尔干纳的定居居民是由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构成，通称为萨尔特，但是，由于在费尔干纳的地区内，萨尔特—乌兹别克人人数大大超过塔吉克人，结果纳里夫金把“萨尔特语”主要理解为“突厥语”。总之，随着乌兹别克人转向定居生活，人们开始如先前那样，不认为乌兹别克人，而是哈萨克人不同于萨尔特人<sup>④</sup>，到了近代，认为萨尔特一词对当地人有侮

辱的贬意，因而不使用了，尽管这个词的最初含意毫无侮辱的贬意。这个词之所以带贬意，只是因为游牧人把看不起种地人和城里人的贬意带进这个词了。突厥人有时带着看不起的神情议论塔吉克人。但是，这较少地反映在语言上，因为塔吉克一词至今仍和它的原初的语言含意紧密相连<sup>⑥</sup>。

### 三

在伊朗居民的居住地区中，蒙古人的侵袭活动完全未曾涉及到的是巴达克山。在早些时期，巴达克山并未置身于征战活动之外。早在前穆斯林时期，突厥人就曾深入到那里。阿拉伯人的征服史上提到过当时生活在巴达克山的突厥—葛罗禄人。葛罗禄王是当时广义的吐火罗的最高统治者，巴达克山已在其版图内。稍后曾提到过一个拥有突厥称号的巴达克山和什格南的统治者。蒙古人出现不久以前，古耳王朝统治着巴达克山。然而蒙古时期有过一种概念，似乎巴达克山不仅在蒙古统治时期，而且以前，未曾归附过任何征服者；似乎在长达三千年的时期内（显而易见，缺乏清晰的纪年概念），盖由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后裔管辖。

欧洲学者倾向于把这个传说视为亚历山大在大夏（Бактриана）山区的行动和同当地的罗克桑公主（Роксан）缔姻的历史事实之余音，但是我们看到，在前蒙古时期，中亚当地的伊朗统治者却力求自封为萨珊王朝的后裔。巴达克山的统治者乃系“亚历山大和大流士大帝女儿”之后裔的传说，最早在十三世纪见之于马可波罗。后来，从瓦罕到达尔瓦斯，包括喀拉提锦在内的阿姆河上游地区和印度河上游诸支流（Читрал）的整个一片地区的统治者们都自称为亚历山大的后裔。十五—十六世纪穆斯林文献也证实巴达克山诸王出身于亚历山大。据说亚历山大的慕僚们曾给亚历山大留在巴达克山的后嗣们写有一份训示，以此训示保障巴达克山的独立，看来这是把它的独立同它文化上与相邻地区的隔绝状况联系起来。当最后一位巴达克山王—苏丹·穆哈默德（十五世纪）开始醉心于波斯文学，并自己动手用波斯语写诗的时候，这被看作是对亚历山大遗训的破坏。从那时起，巴达克山归附于帖木儿后裔政权之下。乌兹别克人的侵袭（十六世纪初）引起了巴达克山的民族运动，其遗迹乃是科克查（Кокча）河左岸上存留的卡拉·伊·法札尔要塞（此要塞从前另有它名）。先前曾身为巴达克山王的大臣，后为起义运动首领之一的穆巴列克·沙赫、穆札法尔（Мубарек—Шах Музаффар）重新修复了这个要塞。穆巴列克·沙赫赶走了乌兹别克人，但是，他后来死于同自己的竞争对手祖拜尔·拉吉（Зубейр Радн）的斗争中。民族运动首领的内讧有利于帖木儿的后裔们。帖木儿后裔中的米尔札·罕（Мирза—хан）除掉了祖拜尔，后来又取得对以沙赫·拉吉·哀丁（Шах Разн ал—Дин）为首的伊斯玛依勒教派运动的胜利。

帖木儿子嗣统治巴达克山持续到1584年，接着布哈拉汗阿布都拉（Абдулла）征服了巴达克山，从这时起到阿富汗人占领阿姆河迤南的所有乌兹别克人的领地之前，巴达克山一直处于乌兹别克的政权下。十七世纪末乌兹别克汗政权崩溃以后，在巴达克山执掌政权的是另一个艾米尔王朝。这个王朝的创建人是雅尔伯克（Яр-бек）—现今的巴达克山都城碑素阿巴特（Фаязабат）的建设者。这些乌兹别克的王们<sup>⑥</sup>

也自称是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后裔。伊施卡什姆(Ишкашим)和瓦罕被置于巴达克山人的最高统治之下,由是这一时期在那里被称之为“乌兹别克人的时代”。可能,不受乌兹别克人管辖而独立的是难以接近的达尔瓦斯和喀拉提锦地区。史家马合木·伊本·维里(Махмул ибн Вели)说,只是在回元1047年(公元1637—38年),乌兹别克人才第一次控制骨咄地区的卡拉·伊·胡木要塞(Кала-и Хумб,是达尔瓦斯的主要城市)。乌兹别克人的首领是出自卫拉特(Ойрат)氏族的巴肯阿塔里克(Бакы-аталык)。首领沙赫·噶里卜(Шах-Гариб)被杀,他的首级被送到布哈拉。指派了自幼生活在乌兹别克人宫廷(在巴尔黑)的他的弟弟沙赫·柯尔柯孜(Шах-Кыргыз)取代他,显而易见,是充当乌兹别克人的属臣的。或许,十九世纪末,С·Д·乌斯洛夫斯基听到的传说是这一事件的余音。人们对他讲,卡拉·伊·胡木城取名于“艾米尔阿布杜拉汗的总督,柯尔柯孜汗管辖达尔瓦斯的十六世纪”<sup>②</sup>。当然,纪年的含糊不清是完全可能料到的,更有甚者是,在突厥斯坦有倾向于把所有的大事件都归之于帖木儿或阿布都拉汗时期的说法。关于喀拉提锦,同一部史料说,回元1045年的七月(Рагжаб,公元1635年12月11日—1636年1月9日,即通常认为不能通过喀拉提锦的冬季),在十二名首领的率领下,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一万二千户吉尔吉斯人(Кара-Киргизы)通过喀拉提锦来到希撒尔。这十二名首领全都在下一个月初受到住在巴尔黑(Балх)的乌兹别克汗的召见。就是在现代,有时也援引一种传说,说喀拉提锦先前曾归附吉尔吉斯人,只是不久前,它才为塔吉克人所占领。这是少有的突厥人夺取的政权,重又易手伊朗人的实例之一。尽管喀拉提锦在“拉什特”(Рашт)的名称下,早在十世纪时就已经是穆斯林的地区了,但是,1820年梅茵多尔夫在布哈拉听到,说它是并不凶狠的异教徒地区。据梅茵多尔夫的记述,卡拉·伊·胡木是具有威慑力量的异教徒的支柱。实际上,伊斯兰教早就达达尔瓦斯和它的东南地区的居民信奉的宗教了。

关于十九世纪塔吉克王国的历史,我们从西欧的和俄国旅行家那里得到许多消息。正如所料,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特别是纪年方面。应当搜集和批判地审定这些资料,但是迄今为止,这项复杂的工作尚未完成<sup>③</sup>。阿姆河上游地区几乎完全没有文字,了解自己地区往昔情况的人又不多,在这种条件下把旅行家的记载和当地居民的传说进行对比,是比较困难的。什格南人谢义德·海答尔·舒(Сейд Хайдар-шо)1912年底用波斯语编写的并由А·谢米诺夫译成俄文的什格南历史梗概<sup>④</sup>,实属例外。在译者的注释里,援引了旅行家的,特别还有出自俄国官方文件的消息。另外,还有Кушкеки<sup>⑤</sup>地方的布尔汗丁罕(Бурхан-ад-Дин-Хан-Кушкеки)的波斯文的《卡他甘<sup>⑥</sup>和巴达克山旅行指南》。这部书是近年来,已经是艾米尔阿曼努勒执政时代,为武装部长穆哈默德·纳迪尔罕旅行编写的。这本书里,除了地理记述外,还有历史概要,即一般简史(12—18页),巴达克山史(162—173页),什格南史(336—348页),达尔瓦斯史(356—365页)。概要写得很肤浅,常有矛盾。由于И·И·札卢宾之助,我才读到这部书。

我不准备详细论述细节,也不试图剖析人名和日期的矛盾之处;仅限于比较主要的事实。塔吉克王国依附于巴达克山乌兹别克政权既未避免内讧,也未解除和达尔瓦斯的战争。达尔瓦斯未曾依附巴达克山和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执政的浑都斯王穆

拉德伯克(Мурад-бек)。穆拉德伯克一度征服巴达克山和它迤东的地区,还有南面的奇特拉尔及北面的库里雅布。穆拉德伯克在山区的活动并不成功。在什格南,由于雪崩,他一次就损失了近一百人,虽然征战是在夏天进行的。据旅行家伍德的记述(J. Wood),达尔瓦斯的王,至少同他的软弱无力的诸邻国相比较,领有大量军队<sup>③</sup>。关于喀拉提锦,伍德说(仅据传闻,说欧洲人中,最先来到这里的是俄国人,况且是在1878年)喀拉提锦在臣属于谁的这个问题上动摇于浩罕和浑都斯(Кундуз)之间<sup>④</sup>。大家知道,喀拉提锦是浩罕的迈买底里汗(1822—1842年)征服的。有消息说,那个时候浩罕首领穆哈默德·舍利夫阿塔里克(Мухаммед-Шериф-аталик)占领了达尔瓦斯。达尔瓦斯的“阿奇木”苏丹·马合木·罕(Султан-Махмуд-хан)被押往费尔干纳,死于途中,被葬在沙黑马尔丹(Шахимардан)。在1842年后的浩罕汗国骚乱时期,达尔瓦斯和喀拉提锦都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尽管浩罕汗仍不放弃对喀拉提锦的僭望。但是七十年代,达尔瓦斯和喀拉提锦被布哈拉<sup>⑤</sup>占领了。据А·А·谢米诺夫记述,出自亚历山大之后裔的达尔瓦斯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西拉兹汗(Сирадж-хан)被俘,死在布哈拉。他的兄弟马合木汗(Махмуд-хан)是阿富汗的艾米尔阿布都拉赫曼(Абдуррахман, 1880—1901年)的大臣。在达尔瓦斯,“当地人和一些布哈拉的官吏”对谢米诺夫也是这样说的。据布尔罕丁记述,“马合木沙”是达尔瓦斯的王,当阿布都拉赫曼在撒马尔罕(1869—1879年),到布哈拉人占领达尔瓦斯前后的那段时间,就同他有了关系,因此阿布都拉赫曼一上台,登上王位,就召请被逐出达尔瓦斯后住在马尔格兰的马合木沙和阿夫札里沙兄弟二人前往喀布尔。几年以后,这兄弟二人都死在那里。А·А·谢米诺夫在卡拉·伊·胡木看到出自亚历山大后裔的,从前的达尔瓦斯王的“被打碎成几块的石头宝座”。С·Д·马斯洛夫斯基提到“保存到现今的用花岗石打制的,据说是亚历山大·马其顿的战友制作的锅。据当地人说,似乎由于这口锅,才有了卡拉·伊·胡木的名称(字面意思是“锅要塞”)”<sup>⑥</sup>。

喀拉提锦的命运可能争执比较多。它一度归附浩罕,因此对浩罕汗在帕米尔和喀什噶利亚的往昔领地提出要求的俄国政府,是可以宣布喀拉提锦是自己的领地的,然而,这种情况未发生。1876年八月费尔干纳归并俄国以后,斯科别列夫(Скобелев)和喀拉提锦的伯克签定了边界条约,喀拉提锦仍附属于布哈拉。

阿姆河比较偏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地区逐渐为阿富汗所控制。这一过程开始于1854年代,阿富汗艾米尔多斯特·穆哈默德执政时期,几乎经过四十年,到八十年代才结束。当地的统治者几次归附阿富汗人,一遇有利时机,他们重新反对他们。在俄国人行动的影响下,阿富汗人有时采取措施巩固自己的统治。由于1882年夏,医生暨植物学家列格里(Регель)来到什格南,艾米尔阿布都拉赫曼派遣古里札尔罕(Гюльзар-хан)去什格南。他成功地规劝当地的统治者玉素甫·阿里汗(Юсуф-Али-Хан, 1871年也提到这个人,他的兄弟沙赫·阿米尔·伯克因倾向于伊斯玛伊勒教派,被其父阿布都·阿勒·拉西木取消了对什格南的继承权,六十年代他一度统治瓦罕)到巴达克山。他和他的儿子,罗善的统治者库巴德(Кубад)在巴达克山被执并被押往喀布尔。有鉴于此,英国人约特(C. E. Yate)1886年说罗善当时处于其世袭的艾米尔的政权下的说法就不正确了。最后一次起义发生于1888

年，是由于艾米尔阿布都拉赫曼的堂兄弟，阿富汗属下的突厥斯坦总督伊斯哈克（Исхак）反对他（伊斯哈克后来逃到俄国），从而阿富汗的军队扫荡什格南引的。当时适遇从前的什格南统治者的后裔穆哈默德·阿克巴尔罕（Мухаммед-Акбар-хан）从希撒尔来到什格南。伊斯哈克失败以后，阿富汗人回到什格南和其他地区。据М·С·安德列耶夫记述，在1889年和1891年间，阿富汗人统治着泽巴克、瓦罕和伊施卡什姆。1895年的帕米尔划界结束了扼杀塔吉克人的政治独立以及俄国、阿富汗和布哈拉三家瓜分它的地区的局面。划界在经济上对居民是不利的，因为巴达克山政治上被同它经济上经常联系的地区分割开了，如西面的库里雅布，东面的什格南。

在突厥斯坦的三个乌兹别克汗国中，塔吉克语言在布哈拉汗国用作国事公文和文化语言最多，在希瓦汗国用得最少，浩罕在这两方面都居中。和希瓦相比较，塔吉克的因素在布哈拉十分强大，以致希瓦史家把布哈拉的军队叫作塔吉克的，虽然在布哈拉，尤其在军队阶层中，乌兹别克人占主导因素。塔吉克语不仅在布哈拉汗国，而且在1920年9月成立的布哈拉共和国都是国语。

随着乌兹别克人过渡到定居生活，塔吉克人和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多地退到诸山中。这一重要情况的出现促使纳里夫金得出“塔吉克人向往群山是他们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特性”的不正确结论。乌兹别克人过渡到定居生活对整个突厥斯坦的意义反映在Кышлак这一词（突厥语的‘冬宿地’）的命运上。1598年一月，即布哈拉的阿布都拉汗逝世前夕写的一份文件里，引过了Дех-Нишин，Кышлак-Нишин和Сахра-Нишин（即住在农村，冬宿地和草原上的人）三者的差别。住在冬宿地的人（对他们说来，冬宿地逐渐成了他们唯一的住地）在完全定居的种地人和游牧人之间居中。大家知道，如今Кышлак是完全定居的种地人的村子，不仅乌兹别克人，而且塔吉克人，甚至山地塔吉克人都称自己的村子为Кышлак。

俄国人的征服解除了塔吉克人的村镇受突厥游牧民的掠夺袭击之害。奇尔奇克（Чирчик）河上游的皮斯坎镇最后一次遭受吉尔吉斯人的掠夺是在俄国人攻占塔什干时期，即1865年前后。在俄国人的统治下，这样的掠夺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在建立了秩序和改进交通道路条件的影响下，大多数人使用的乌兹别克语越来越成了全体居民的语言。正如人们告知我的，在征战时代，在奇尔奇克河上游的山地村镇，没有人懂得突厥语。我本人在突厥斯坦的旅行期间，只有一次在布哈拉听到说“我不懂突厥语”。科学院院士拉德洛夫1868年在撒马尔罕的街道上听到几乎是清一色的波斯语，当我在那里的时候（1904年），人们说突厥语比说波斯语要多得多。用这种语言比用波斯语更容易和俄国政权进行交涉、解释，因为俄国人随身带着塔塔尔人和吉尔吉斯人的翻译<sup>①</sup>。由于这个原因，失势的先前撒马尔罕的卡孜卡梁凯马尔丁（Казы-Калян Кемаль ад-Дин）在1861年未用自己本族波斯语，而用突厥语写了一份申辩无罪的声明，以便用俄语解释其内容。大致在这个时期的前后，认为要在官方的《突厥斯坦公报》篇幅内，出版当地语言的附录。最初规定塔吉克语和“察合台语”以及吉尔吉斯语<sup>②</sup>为地方语言，后来则曾说到“突厥语（萨尔特）和吉尔吉斯语的附录”。从1871年起用这两种语言，每月出四次附录，即萨尔特语和吉尔吉斯语各二次<sup>③</sup>。从1883年起，改成用一种“萨尔特”语出版篇幅不大的报纸。当



1920年制定突厥斯坦共和国宪法时，只承认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为“本地民族”，而边区最古老的居民——塔吉克人却被遗忘了。至于1924年的民族划界将在何种程度上促进塔吉克民族的复兴有待将来验证<sup>③</sup>。

## 注释

- ① 关于塔吉克人和塔吉克斯坦历史及与其相关的其他中亚民族的历史问题的文献和研究书目可参阅Б·Г·加夫罗夫：《塔吉克族简史》，莫斯科，1955年；《中亚民族》，一卷，701—703页——В·拉莫丁注。
- ② 比鲁尼：《古代民族纪年》。关于新出版的主要的有关粟特语言和花拉子模语言的材料和研究，参阅本书115页的注<sup>④</sup>和122的注<sup>⑤</sup>，还有459页的注<sup>⑥</sup>——В·拉莫丁注。
- ③ 如W·B·海宁的证实，敦煌的粟特文书不是公元一世纪，而是四世纪的，参阅W·B·海宁：《粟特古文献日期》——Б·斯塔维斯克注。
- ④ 摩尼的学说产生于公元三世纪，是建立在溶合了古代波斯的祆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基础上的。
- ⑤ 这里用的“Турки”和“Турецкий”词在俄国的科学著作里的含意通常和在突厥斯坦、外高加索的含意一样，其意同学者们杜撰的“Тюрки”和“Тюркский”词。俄语和科学术语的发展使得“Тюрки”和“Тюркский”两个词稳定地作为涉及许多，或者有关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的集合术语，而“Турки”和“турецкий”保留着比较狭窄的意义，现在只用于安纳托里亚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语言，土耳其国家（过去的“奥斯曼”）——В·拉莫丁注。
- ⑥ 这个城的准确位置尚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在楚河河谷。
- ⑦ 或恒罗斯，即奥里阿塔（现在是苏联哈萨克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江布尔城）。
- ⑧ 可能，这个城在奥里阿塔迤西。
- ⑨ 关于粟特殖民地的书籍，参阅本书114页的注<sup>⑩</sup>。
- ⑩ 关于粟特语和吐火罗语的详细论述，参阅В·В·巴尔托里德：《论粟特语和吐火罗语的问题》——В·拉莫丁注。
- ⑪ 关于塔吉克（Таджик）这一术语源出Тази和Тазик及其原初含意“阿拉伯人”的情况，也可参阅本书121页的<sup>⑫</sup>注——В·拉莫丁注。
- ⑫ 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写成《赫拉特史》的赫拉特作者谢伊夫丁（Сейф ал-Дин），在使用Таджик写法的同时，也经常使用Тажик这一书写形式。这部史书在В·В·巴尔托里德逝世后出版。参阅谢伊夫·阿勒·赫列维（Сейф ал-Херевн），本书索引——В·拉莫丁注。
- ⑬ 不能同意巴尔托里德的这一论点，参阅本书117页的注<sup>⑭</sup>——В·拉莫丁注。
- ⑭ 正如В·А·里夫森茨所指出的，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就语言说，基督教的